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 与发展研究

王洪玉 ◎ 著

民族出版社

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 与发展研究

王洪玉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4. 11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滕星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3542 - 4

I. ①甘… II. ①王… III. ①藏语—双语教学—
教育史—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 IV. ①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638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朴雪梅

封面设计: 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412 千字

印 张: 14.875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542 - 4/G · 1923(汉 93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在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

中，又可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

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20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5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5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作出贡献。

滕 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序 言

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已经或正在迅速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将面临着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性时代。就全球而言，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一方面构成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又使各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在国内既要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又担心会导致国家分裂的两难抉择，在“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之间寻求平衡。国家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矛盾对现代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语言教育成为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多元文化教育成为世界各多民族国家教育的主流，双语教育正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实施双语教育成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语种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的国情之一，我国也面临着和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同样的问题。这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使少数民族成员一方面通过学习国家族际共同语以达到顺利进入主流文化的现代化社会，同时通过学习本民族语言与文化从而较好地保留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并存和相互学习是促进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共处，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各民族

文化的基础，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双语教育既是解决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各民族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客观需要。然而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个案调查研究，要重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同时对不同模式、不同类型双语教育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理论与实践等进行对比研究，尤其是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只有坚持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原则，才能总结出普遍的规律，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导双语教育实践。

多年来我一直筹划着去藏区，一则想领略一下高原的自然景观和藏族同胞的风土人情，二是希望能考察、了解藏区的教育状况。2010年7月，我途径兰州、甘南合作、青海西宁，最后到西藏拉萨。期间，应甘肃民族师范学院院长张俊宗教授的邀请，和我的博士王洪玉一起在甘南临潭县、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夏河县和合作市进行了短期的教育考察，并在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做了一次有关双语教育的学术报告。尽管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游览，我却感受颇深，至今令人回味。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之缘，东连汉地，西通藏区，曾经是中原地区通往青海、西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具有“汉藏走廊”之称，费孝通先生称之为“藏族现代化的跳板”^①，此地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曾是藏族文化和内地汉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之地，藏民族文化积淀深厚，藏汉双语现象很早就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民族教育以“民汉兼通”为目标，学校藏汉双语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随着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地处边陲

^①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587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的甘南藏区社会文化发生着急剧的变迁，广大藏区农牧民处于文化选择的两难境地：他们一方面积极接纳主流文化，力图融入主流社会，期望分享现代化社会的文明成果，与此同时他们又担心大量“异文化”的涌入会失去本民族的传统语言与文化。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使当地藏汉双语教育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出现了很多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新现象、新问题，但令人遗憾和不安的是当地藏汉双语教育的探索研究却相对滞后，这对于藏族地区民族教育以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我深刻感受到藏汉双语教育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亟待探索研究。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悠久，实施双语教育有着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甘南实施藏汉双语教育既是一种客观需要，又是一种实现国家统一和文化多元和谐发展的政治考量，研究甘南双语教育具有不容置疑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王洪玉是我招收的第一位教育人类学研究方向的藏族博士研究生。王洪玉博士出生在甘南，在当地的民族学校接受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内地普通高校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藏汉双语流畅，并先后在当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整30年，具有较为深厚的民族教育实践资历，无论在语言交流、文化积淀和学识水平上都具备了从事藏汉双语教育研究的良好条件。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文献资料，他较好地发挥了其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于2010年3月完成了以“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在当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匿名外审中获得三“A”（全优），这在教育学院尚属首次，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顺利通过答辩。

《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是王洪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精心修缮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该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理论分析、研究方法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较强的开拓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国内藏汉双语教育研



究领域尚属首例，为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增添了研究个案，提供了新的个案研究方法。

《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一书遵循历史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并辅之以文化唯物论的主、客位研究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甘南的民族教育与藏汉双语教育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丰富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史的个案研究资料。在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文献法、田野调查法和文化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政策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着重探讨了甘南藏汉双语教育个案的社会意义，并从人类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的视域对藏汉双语教育发展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中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历史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预测其发展趋势，既有解构也有建构，前瞻性地提出了颇具可行性的藏汉双语教育模式与发展对策。

这项研究是对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语言文化教育个案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出民族教育的区域特性，寻求双语教育特殊机制与规律，为甘南藏区和相似民族地区教育决策和实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有较强的实践意义。该研究同时也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在方法上突破了单一学科研究的局限，采用了语言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维度上时空交叉，史现结合，主位客位并进，田野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适切性。

总而言之，该研究可以说填补了甘南藏族教育史和藏汉双语教育研究的不足与空白，丰富了藏汉双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贡献。当然，该研究毕竟是对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变革的一项探索性研究，其中自然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

作为他的导师，我深知王洪玉博士在近乎“知天命”的人生阶段，摆脱家庭负担和生活俗事的困扰，在京苦读3年实属艰难，

完成这项研究更是不易。《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一书几易其稿，现今终于得以出版，我深感欣慰，并在此衷心祝愿洪玉博士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就。

以此为序。

滕 星

2012年1月初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目 录

第一篇 研究构想

第一章 导 论	(3)
第一节 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	(3)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8)
第三节 文献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11)
第四节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	(38)
第五节 相关概念的阐释	(50)

第二篇 环境与历史

第二章 甘南藏区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63)
第一节 甘南藏区的教育生态环境	(63)
第二节 甘南藏区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 历史演变	(70)
第三节 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甘南藏区教育的发展	(73)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甘南藏区教育的 发展历史	(82)